绪论

本书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界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汉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民族关系三个重大历史问题而展开的学术争鸣。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犹如长江、黄河奔腾不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绵延不断，在世界几大古老的文明中独树一帜。讲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首先就要讲到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文明的起源，两者虽不完全相同，但却是紧密相连的。我们知道黄河、长江的源头，但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它如何起源，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和我们一样充满好奇，留给我们许多美丽的传说。女娲泥土造人，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以避群害，燧人氏教人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神农氏制造了耒耜教民耕作，伏羲氏则教人占卜和渔猎，创造文字的功绩则归之于仓颉。在上古传说体系，还有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号称五帝，按照今天的观点，它们是部落联盟首领。在五帝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舜以禅让制的方式，让位于治水有功的禹，但是禹死后，禹之子启即位而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开始了“家天下”的时代。古史传说构建了中华民族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但是传说毕竟只是历史留给人们的遥远而模糊的记忆，甚至是臆想，未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代讲求实证的科学研究证明之前，不足以作为信史而采用。古代埃及文明、古代巴比伦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相继经过近代科学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而得到确认，中国方面由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开始得较晚，因而在 20 世纪之前，中华文明的起源始终是一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谜。 20世纪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的探索和史前考古密切相连，并且伴随考古学的发现而不断深入。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的争论主要是西来说与本土说之争，随着中国本土上考古发掘工作的逐步展开，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经历了西来说到东西二元对立说的变化。 20 世纪下半叶，西来说在学术界已无太多的影响，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则经历了一元说到多源说的过程，最大的分歧则是“大一统”与“满天星斗”说。

考古发掘显示,中华大地也是人类起源地之一,中华民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上。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自古及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文明的过程中，作为中华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汉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身为回族的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历史的过程中，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绵不断，论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1]。汉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根据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人口总数 10.4 亿,在世界上率先超过十亿。对汉民族这样一个重要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的研究在 20 世纪 50 年代备受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它和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以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一起，被称为“五朵金花”。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理论指导学术研究的典型例证，学者们对于民族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的不同认识和理解，直接导致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50 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促发了

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入学习与讨论，推动了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新时期以来，理论的禁区日渐突破，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但争论和分歧依然存在。学术争鸣极大地推进了对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认识。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以外，现已确认的有55个少数民族。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55个少数民族总人口是90,447,552，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98%。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是壮族，有15,489,630人，人口最少的是珞巴族，仅有人口2,312人。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兄弟民族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生活、劳作、斗争，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因此，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自古至今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它包括历史上活动而今天已经不存在的那些民族(例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等）。如果从民族角度上讲，一部中国史，实际就是一部多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中国民族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中国民族史的内容，中国历史不完整。

很久以来，人们对民族关系问题就有着不同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真正实现了平等和当家做主，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目标。民族平等的社会现实也对学术界提出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已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关系史实质上是研究中国各民族关系形成的发展过程与内在的规律，研究中国各民族怎样发展形成为统一的国家，这关系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与繁荣。同时，如何正确认识历史上民族关系诸问题，关系到能否处理好现实生活中的民族关系，因此，中国民族关系史诸问题的研究与争鸣，有着特别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族关系史诸问题的热烈讨论是从50年代开始的，分别在60年代和80年代形成高潮，争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中国统一多民

族国家的形成（这一问题之下又可细分为历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怎样理解历史上的“中国”、如何看待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理论等）、民族关系的主流、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民族间的“和亲”、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民族战争的性质及其评判标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民族英雄的评价、史学研究中如何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等等。

学术的进步得益于对以往学术成果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当人们跨入新世纪的时候，用理性的目光回首上个世纪学术发展历程，认真进行总结和反思，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学术的生命力也在于它能回应社会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感受到需要解决诸如怎样宽容地对待不同文明，不同的民族、族群之间应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对中国人而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激发民族自豪感，需要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需要强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认同，需要弘扬和振奋民族精神。由此，对我国学术界而言，中华文明的起源、汉民族的形成以及中国民族关系史诸问题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 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桂同笔录、瞿林东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第一章　中华文明起源的争鸣

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巴比伦和古代中国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它们在人类早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起了引领作用，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人类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瞩目的世界性学术课题，一百多年来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对这一课题作出了深入的探讨，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

国际学术界曾经有一个时期认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但是根据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研究，现在人们认为人类社会中最早的文明之光是出现在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上所说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在大约公元前3500年时，耕耘在这片干旱土地上的人们结成的农村公社，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人类社会中第二个文明的诞生发生在古代埃及，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国王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开始了王朝时期，学者们认为，这时的埃及已具备文明的基本特征，不仅有专职的行政官员、士兵、宗教首领和艺人，而且还有了文字。公元前2500年左右，在印度河两岸又出现了另一个文明。印度早期文明的发现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印度河下游地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块叫做摩享约·达罗的地方所进行的考古工作。科学的考古发掘显示，它们是一系列曾经十分繁荣的城市遗址，之后相继开展的其他遗址的发掘，揭开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面纱。印度河流域文明，按照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地命名的习惯，称为哈拉巴文化，其年代是公元前 2300—公元前 1750 年，具体地说，其中心地区约为公元前 2300—公元前 2000 年，其周边地区约为公元前 2200—公元前 1700 年[1]。

中华文明的起源更是国际学术界长久以来关注的课题。这是因为，在后来历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那些曾经引领人类前进的古代文明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巴比伦文明的发展中断了，印度文明也由于雅利安人的侵入而被覆盖，今天人们只能借助考古学的方法和博物馆的展品，才能感悟和领略到它们昔日的辉煌。但是中国文明却不是这样。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发展绵延不断，一脉相承，辉煌灿烂，对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当然会深深吸引着中外学者。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早期人类文明中的其他文明古国先后发现了五千年前后的城郭、金属器物、文字，从而使五千年文明史建立在科学的考古成果基础上。相比之下，中华五千年文明却缺乏有力的考古证明。就传世文献而言，我国最早的文献记录《尚书》中的《虞夏书》记载了尧、舜、禹相继为帝的情况，说明当时是建立了国家，但经过后代学者的考证，《虞夏书》中的《尧典》、《皋陶谟》和《禹贡》不是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文书，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就是比较可信的《尚书·盘庚》至少也是经过了周人的改动，所以这些文献不能作为当时历史已有文字记载的证据。这样，尧、舜、禹及其以前的黄帝时代，都只能算做是古史传说时代[2]。19 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释读，对于揭开中华早期文明之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 15 万片有文字的甲骨以及精美雄浑的青铜器、兵器以及车马、大型宫殿、陵墓等，揭示出商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人们认定它属于商朝后期的文化，因

为公元前 14 世纪商王盘庚迁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无论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商代文化进入到文明时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再往上追溯，却线索不清。中国考古学的著名学者夏鼐先生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殷墟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么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孩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3]。这样，中华文明的起源就留给中外学者一个巨大的问号。

早在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到中国文明的时候，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存在，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诸说的争论，都是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当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争鸣又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展开，可以说贯穿了近现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世纪之交，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在近百年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基础上，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掌握了更多的翔实的材料，有了更深的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对自身早期文明的起源探索给予热望，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形象问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形象问题，还关系到如何正确地了解古代、现代的世界，乃至把握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4]。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状况，对于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由来及其最初争鸣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最早的论辩是中华文明西来诸说之间以及与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的争论。1920 年，法国学者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在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Etrangers*）一书中的第一章对欧洲数百年来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种种观点进行了评说；1929 年中国学者何炳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二号上发表《中华文明起源之新神话》一文，主要参照考狄的资料，将西方学术界关于中

华文明起源诸说向中国读者介绍,并加以评论.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册,在《种族之起源》一节中,也详细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诸说。以上是研究 20 世纪之前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论争的重要成果。较新的成果有陈星灿 1997 年出版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5]一书中的相关评述。本书的撰写参考了上述成果。

(一)中华文明西来诸说

1.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

中华文明西来说最早的说法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此说的创始者是德国耶稣会教士基尔什尔 (Athanase Kircher, 1602 - 1680),他在 1654 年出版的著作《埃及谜解》(*Cedipi Aegyptiaci*)一书中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后来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中加以重申。后者 1667 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原文为拉丁文,1670 年又翻译成法文出版。基尔什尔关于中华文明源于埃及说的理由是中国的文字与埃及的古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其中必有联系,他在《中国图说》第六编中专论中国文字,计分五章,第四章讨论《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异同》,他的观点主要是古代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字是从埃及传入,只不过后来中国文字发生变异。他说道:

古代中国人既系埃及人之苗裔,故其书法亦一遵埃及之旧,此非指文字之结构而言,乃指其各自各种自然事物中提出之形象而言,中国人实籍此以表示其观念者也。中国文字之标记所以与其所欲表明之事物同其数量,其故即在于此。

含之子孙,既率其殖民者以至中国,并携文字以俱往,唯并未将埃及象形文字所含之真义全部传入也,仅取其足以说明思想及表示概念与情感之必要部分而已,唯稍粗率耳。

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上所有事物均创制有文字，而足以应付一切之用途，此可于其编年史及其文字之形象上见之：盖其制造文字之程序与埃及同；最初所造者所以代表鸟兽；继之以虫鱼，终之以草木，线，点，圈，及其它事物。然文字虽同而与后代中国人之书法已异，盖因对于事物经验丰富之后，学术较深，能力较大，故将文字全部加以改变，将鸟兽草木均置于相似混乱之中以求古代书法之更为便利而简短焉。[6]

与基尔什尔观点相同的还有同时代的波兰人波因谟（Michel Boym，中文名字是卜弥格），此人也是耶稣会教士，曾来东方传教，1659年死于中国广西。对于波因谟，何炳松先生评价说："其中国学问甚为浅陋，且亦博而不精，盖一长于神思而拙于考订之人也。"[7]

1716年，从事古代商业研究的法国阿夫郎什主教胡爱（Huet）主张，不仅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印度也是一样。他在1716年出版的《古代商业航海史》一书中写道：

就吾人所有之材料而论，埃及在东方之商业亦甚古而且盛，是吾人可以断言印度人商业之繁盛亦与埃及相当，盖印度人本埃及人之主要商伴也。……然印度与埃及商业之相当既有古代史为之证明，则当吾人读史时，不能不信中国与印度两民族虽非全属埃及人之苗裔，至少其大部必属埃及人。

在两群入侵印度之埃及人中，中国人尤堪注意。中国人对于本族起源之感觉极灵；其习惯于埃及人极其符合；其正体与便体之两种文字甚至语言，信轮回之说，养黄牛之习，亦复相似。而尤足使予惊叹者，则中国人反对外国商人之入国，始终不变是也，此与斯特拉波（Strabon）所述古代埃及人之态度竟完全无异。[8]

受胡爱影响，法国科学院美朗（Jean - Jaeques D'Ortous，Sieur

de Mairan）继续证明中国人来自埃及，1759 年他在致巴累囊（Dominique Parrenin ，中文名字为巴多明）信中说，中国和埃及“风俗习惯之相同，实为解决此问题最大而且予并以为独一无二之证据也”。他还认为，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埃及王拉姆西斯二世（Ramses Ⅱ）率领十万埃及人远征中国之事，并无不可能。

1759 年，法国人得基涅（M. de Guignes）也主张中国人为埃及人之苗裔，他的灵感来自于偶然间对腓尼基字母与汉字的对照，“在吾眼前者有一篇正确之腓尼基字母。吾为自娱起见，乃注吾两眼于一含有古文之《中国字典》上：吾忽见有一字其形式与一腓尼基之字母相似，不禁为之一惊。吾于是专注于此种关系，继续核校，不意其中证据极多，令人拍案惊奇。’于是他说‘：吾于是深信中国之文字、法律、政体、君主，甚至政府中大臣及全部帝国均源自埃及。而所谓《中国古代史》实即《埃及史》，弁诸中国史之首而已。”[9]

1744 年研究埃及象形文字、中国编年史及文字的英国人华柏敦（Warburton）的著作中仍然流露出中国文明源自埃及的思路。华柏敦认为文字初起，“用以代表动物或事物之文字其形状一依自然”，后来由于哲学研究的发展，遂产生象征之文字。埃及的哲学发达，哲学家们觉得依样葫芦之文字为数太多，繁重可厌，于是产生另一种文字，华柏敦将其称作“象形文字之‘流行体’”，并说：“此种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最初以各种象形之外形制成，日久渐成一种符号。”[10]

1834 年，传闻在第伯斯（Thebes）地方的埃及古墓中发现了中国的瓷瓶后，中华文明源自埃及说又曾盛极一时。据说这些古墓“皆系西元前一八〇〇年（夏桀十九年）前旧物，且从未经人发掘者”。意大利比萨的埃及学专家罗色利尼（Roselini）、英国的学者威尔金生（J. Gardner Wilkinson）与大卫，都深感惊奇，信以为真。英国学者威尔金生说：

在第伯斯古墓所发见之多数磁瓶中，最足令人惊奇者以中国

人所制并题有中国文字之磁瓶为最。此种偶尔发见如仅获一个磁瓶，当然无人注意及之；而且如吾人以埃及古墓中有此种物品为可异，吾人亦或可假定其为现代某游历家在古墓中搜求珍品时所遗下。然吾人今知藏有此种磁瓶之古墓在第伯斯不止一处，则上述曲解实难通过也。[11]

一些严谨的学者认真研究了埃及发现的瓷瓶后指出，从瓷器的质料、题字来看，与中国上古时代同时期的埃及古墓决无发现这种瓷器的可能，这些古瓶皆系明代所造之物。后来所谓埃及古墓出土中国古瓶之谜被揭开，证实了质疑者的观点。

主张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者，也有从西洋古史中寻找依据的。主要的依据是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e)与西西里史学家提奥多尔(Diodore）著述中关于埃及历史上有名的君主拉姆西斯二世向东征服的记载。其实，希罗多德的记载是非常谨慎的，并没有说拉姆西斯二世向东征服中国，提奥多尔的记载显然因袭了希罗多德的记载,但加上了"渡恒河入印度以达于大洋"之语,有人更为大胆地提出，西元前一五〇〇年或一六〇〇年时,拉姆西斯二世征服中国。何炳松先生评述说："此种论证方法非空中楼阁之建筑家曷可臻此!"[12]

2.中华文明起源于巴比伦说

除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外，也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之说，发表的相关著述极多。1866 年,英国人且尔曼(John Chalmers)著《中国民族由来论》（*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从言语、文字、美术、宗教及传说、神话上,考证出中国民族与西亚民族吻合之点,是为巴比伦说之滥觞,只不过在学术界里影响甚微[13]。

中巴文化同源说的主要倡导者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古柏利(Terrien de Lacouperie）,其主要根据在于巴比伦的锲形文字与中国文字相似,最著名的著作是他于 1894年在伦敦出版的《古代中国文化西源考》（*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300 *B. C. to* 200 *A. D.*)。

根据拉古柏利的说法，中国文字来源于巴比伦的巴克（Bak）族，中国古籍《尚书》中记载的"百姓"一词实际上是巴比伦"巴克"一词的转音；"百姓"之容貌应为碧眼、绯面而发不黑，以别于中国的"黎民"，公元前3世纪时，秦始皇称人民为"黔首"，可见所谓"百姓"并非"百家"之谓，乃系巴克族之专名；"百"字非数也，实际上是"巴"字的转音。拉古柏利还提出一些所谓的证据对他的观点进行证明，他说，巴克族移居中国后，对故国旧习多未能忘：一、保存了关于洪水的传说。二、神农即巴比伦的萨贡（Sargon）。三、仓吉即巴比伦古史中的同基（Dungi）。四、黄帝即巴比伦古史中的那洪特（Nakhunte）。五、皇古时代半鱼半人之先后辈出及文字之起源。六、人生吉凶之说及历书等。[14]

法国人皮奥（Edouard Biot）也主张中国文明源于巴比伦说。皮奥是第一个将《周礼》译成法文的人，1851年法文版《周礼》出版，他在《周礼导言》中说：

《圣经》及《四书》为中国古史之根据，就其中可信之资料而言，中国最古之民族系野蛮之猎人。当西元前三十世纪与二十七世纪之间有一队外人自西北侵入。此种外来人在书中通称为"黑发之民"，此盖所以别于土著之发色不同者或杂色者而言，殆无疑义。此辈土著至今尚残留于中国中部山中也。此辈外来人亦称为"百姓"；其最初事业正与初期殖民于北美洲之垦植者相同。[15]

西方学者中附和中巴文明同源说者颇不乏人，例如英国教士鲍尔（C. J. Ball，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他于1913年出版了《中国人与苏美连人》一书，在导言中，他用分析的方法说明苏美连（苏美尔）文字的性质，接着开列两种文字中同形文字的比较表，又将中国文字与苏美连文字分为若干类，最后举出中国文字与苏美连文字中相似甚至绝对相同者。在东方，日本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899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1903年被译为中文出版）中也赞同

中巴文化同源说,他们在书中列举中国与巴比伦在学术、文字、政治信仰、传说中相类似者七十条加以证明。[16]

3.中华文明起源于印度说

1853年法国学者哥比诺（A.de.Gobineau）提出中华文明源于印度说。1853年他在巴黎出版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一书中写道：

一切均足以证明《摩奴法典》所言之无误,而且因之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实由印度英雄时代后一种印度民族——即白色阿利安种之首陀罗人——传入之。而中国神话中之盘古实即此印度民族迁入中国河南时之酋长，或诸酋长中之一，或即白种民族之人格化；正与前此一群印度人之迁入尼罗河上流同。

是故在亚洲另一端之中国，正与在埃及及其他各地同，彼造物者特命一群白种人负发明一种文化之责任。[17]

4.中华文明起源于中亚说

有学者认为世界文明原本是同源的，中华文明不过是其中一支，它源于皇古时代的一种民族。这一说法的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巴伊(Sylvain Bailly),1775年,他在巴黎出版的《古代天文学史》中提出了他的见解。他说："当吾人注意研究巴比伦、印度与中国之天文学时,吾人所见者盖一种科学之残余,而非一种科学之原质"。这些民族"对于同样主要简单之原质有极其了解者，亦有不甚了解或仅大致决定者"；"诸族所有之天文学盖前代一种民族之成绩,天文学之进步即系此辈之功，可无疑义；唯其大部分之知识至今已不传耳。'这种人类共同的祖先'为一种大革命所覆亡",这一民族一部分发见、方法及其发明的年代保存在流亡在外者的记忆中，传布的地方包括中国、印度与巴比伦诸地。巴伊还向伏尔泰宣传他的

主张，说古代诸民族在科学上有共同点，“此种同点并非由互相往来之故而产生，且亦非由于自然本质之所致，而实出发于同一之渊源且为一种较古民族制度之残迹。”巴伊得出的结论是：

此种民族有完备之科学，有一种高尚聪明之哲学。其居处似在亚洲，近北纬四十九度之处。其科学上之光明及其人口似播向南北两方云。[18]

1778 年法国著名生物学家布芳(Buffon) 宣布人类文化发源于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无天灾人祸之中央亚洲北纬四十度至五十度之处。

英国汉学家里格 (J. Legge)、19世纪后期俄国的 B.皮·瓦西里耶夫和 C.格奥尔吉耶夫斯基、美国考古学家攀伯里 (R. Rumpelly) 等也都主张中华文明来源于中亚。[19]

曾在新疆地区进行过学术考察的德国人李希霍芬 (Richthofen) 提出,新疆塔里木盆地不仅是中国人(汉族)的发祥地,也是许多其他古代民族的发祥地。他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北史》中关于于阗人的记载,该书说于阗人“貌不似胡,颇类华夏”;而于阗以西之人则“深目高鼻”或“青眼赤须”,属于白种人,因此李希霍芬推断中国人即由于阗而东来。[20]

(二)关于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最初争论

中华文明西来诸说在其提出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学术界就不断引起争论,反对的意见此起彼伏。

从古代埃及与中国文字相同入手认定中国文明起源于埃及的说法提出不久，学术界便出现反对意见，并且争论一直持续着。1718年法国美术文及刻文学院永久秘书法累累 (Nicolas Freret)在学院宣读论文,反对基尔什尔中国文明源于埃及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古人和埃及人对于图形的理解是不同的:“中国人除非将图画置于其眼前,其心目中绝无意像,亦无象征用寓言和引喻以代表无形

之事物”，基尔什尔以中国和埃及在象形文字方面的相同之处来认定中国文明源于埃及的说法，“似过于凭藉其神思。吾固不能敢为事物与代表之文字间并无相似之处；然吾敢断言吾人始终未尝研究之，而且一旦加中国文字以分析工夫，则其意义几且全被破坏也。”法累累明确表示，中国文明应当起于土著：

中国始制文字者纯用武断之标记，或仅有一种所表事物与制度之关系。中国人于此系出诸民族之天才，盖虽在伏羲以前——即皇古时代——即有结绳方法以代文字。结绳之数代表一字，而集数绳于一处有同一书，以便在人类精神中可以回忆或固定已往之事物而不致于磨灭焉。。[21]

对于美朗的观点，美朗的朋友，留居中国的博学的耶稣会士巴累囊，明确表示反对，他致函美朗，对其观点进行了反驳。

当得基涅沉溺于宣扬自己的‘发明’的时候，对骚德累（Leroux Deshauterayes）发表《得基涅论文质疑》，对得基涅的观点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对骚德累指出：得基涅希望证明三个方面的问题，但都存在较大疑问。他说：

（一）中国文字不过有三种腓尼基字母所造成之一种单字，读诵时每产出腓尼基或埃及之音。（二）中国最初二朝之君主实居于埃及而不居于中国。得基涅证明两地君主系属一人时，既不基于两地历史之相同，亦不基于两地事迹之相同，而仅基于中国帝王各（名）字之读音，以为系腓尼基字母所构成。（三）最后得基涅自以为已经证实埃及人迁入中国之事，而定其时代为西元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十三年）。此为中国史上武王建设周朝之一年也。[22]

坚决反对中华文明源于埃及说者，还有法国学者得保（Cornelius de Pauw）和著名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何炳松译为‘福禄特尔’）。1774 年得保在《埃及人与中国人之哲学研究》一书中指出：

至于吾人意想中所有中国与埃及间之交通，吾人试读此书，即可知此种假说实无根据。最可怪者，彼主张中国民族来自埃及之人竟不知当西元前一一二二年时，埃及人已用一种由字母之文字，据史家普鲁太克谓以二十五个字母构成，而据现代发见则谓仅有二十二个。然彼富于幻想之徒必且谓埃及人携往中国者非简单之字母也，乃祭司所独用且与中国文字毫不相似之象形字耳，诚可谓荒谬绝伦也。且在两国之宗教与语言上，吾人亦不见有何种关系焉。

伏尔泰在他 1773 年出版的著作《通史鳞爪》中鲜明地指出：

就吾人所知者而论，中国人似非埃及人之苗裔，正如其非大不列颠人之苗裔。彼主埃及人曾殖民于中国者，不仅费其一己之精神且亦并费他人之精神。吾人固不能不赞叹其学问之博与用功之勤 然中国人之容貌、习惯、语言、文字、风俗等，实无一来自古代之埃及。中国人决不知有所谓割势之礼；亦不知埃及之神祇；更不知爱西斯之神秘。[23]

在第伯斯地方的埃及古墓中发现中国的瓷瓶一事，在欧洲学者中引起争论。一些严谨的学者对所谓出土于埃及古墓中的中国瓷瓶进行了研究，对埃及古墓出土中国瓷器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英国学者麦特赫斯脱(W. H. Medhurst，中文名字麦都思)认真研究了 12 个埃及发现的瓷瓶后指出，从瓷器的质料看绝非汉代以前之物，从瓷瓶上的题字来看，绝非唐代以前之作，与中国上古时代同时期的埃及古墓决无发现这种瓷器的可能，这些古瓶皆系明代所造之物。法国学者得康什(F. Feuillet de Conehes) 、英国学者巴克斯(Herry Parkes)、美国学者摩尔敦(Semuel George Morton)也都对埃及古墓出土中国瓷瓶表示怀疑。德国学者白鲁门巴哈 (Blumenbach)、美国学者摩尔敦从人种学上将埃及人和中国人区分开来，

断言埃及人实与中国人所属之蒙古种并不相同。后来所谓埃及古墓出土中国古瓶之谜被法国学者普利斯（Prisse）揭开，他询问开罗城中的古玩商人，据称这些瓷瓶实际上来自红海与印度通商的一些港口，并非从埃及古墓中发掘。按照何炳松的说法，“夫以一阿拉伯古玩商人之恶作剧，竟费却西洋学者如许之脑汁与笔墨。诚可谓学术界中罕有之笑话也。”

对于巴比伦说，西方学术界也不断有反对意见。早在19世纪之初，就有克拉普罗特（J. Klaproth）指出，得基涅关于中国象形文字是腓尼基字母组合的假说已经被严肃的学者推翻。1893年，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米勒在其论著中也说，中国文字起源并不在巴比伦，巴比伦居民塞姆支克种族所使用的文字 Cuneiform Alphabet（楔形文字）是由 Sumerian（苏美尔）和 Accadian（阿卡德）种族所发明的，但这两个种族均非塞姆支克种族。中国人从什么时代借用它并不明确，中国文字与巴比伦文字的关系并不清楚，因此他认为，这完全属于未解决的问题[24]。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对拉古柏利评价道：“此人富于神思而拙于科学；其学识博洽有余而精审不足；既不谙巴比伦之历史，复不审中国之情形；不顾历史上之年代，仅依据近人之论著，于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适合其一己之见；其学说骤视之颇觉规模宏大，门面辉煌；然稍加检查即全体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25]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从语言上证明熊黄帝说的错误[26]，德国人夏德（F. Hirt）在《中国上古史》一书中也反驳了拉古柏利，认为拉古柏利的假说为穿凿附会，不足为凭[27]。

西方人在主张中华文明西来说的时候，也有学者提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1862年法国人罗索密（Leon Rossony）倡导中华文明起源本土说。之后，有威尔斯（Wells）、约翰·洛斯（John Ross）也支持该说。特别是洛斯，1916年他出版《中国民族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旨在反驳所有中华文明西源论的假说，试图证明中国民族的土著性（autochthonous）和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不承认汉民族有所谓移民时代。洛斯甚至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